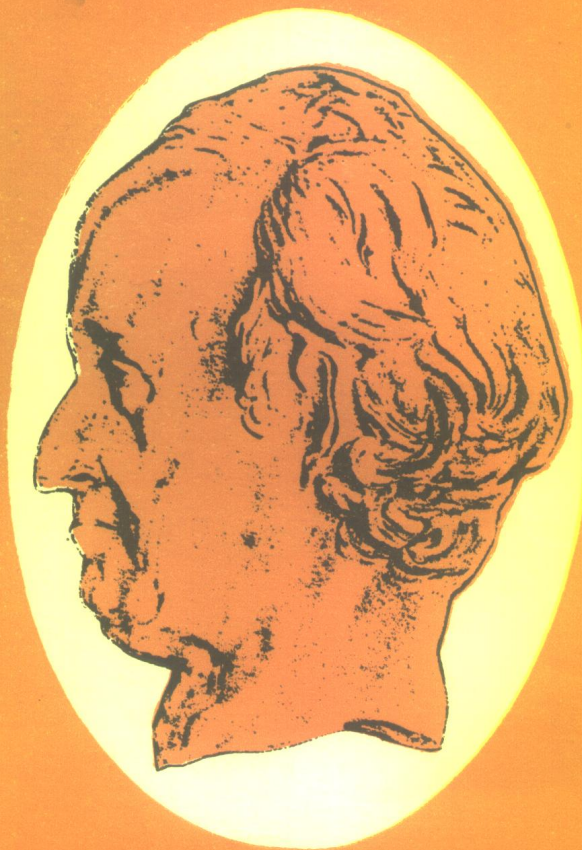




第一个职业革命者—— 菲利浦·邦纳罗蒂

〔美〕伊丽莎白·L·艾森斯坦因著

商务印书馆

第一个职业革命者—— 菲力浦·邦纳罗蒂 (1761—1837)

〔美〕伊丽莎白·L. 艾森斯坦因 著

曹茂良 陈友松 译

奚瑞森 朱立人 校

这就是他胸有成竹的抱负：
别无他虑，只想到我们的事业，
忍饥挨饿，从事地下工作，
而隐姓埋名。

W. H. 奥

商 务 印 书 馆

1991年·北京

THE FIRST PROFESSIONAL REVOLUTIONIST

FILIPPO MICHELE BUONARROTI

(1761—1837)

A Biographical Essay

by

ELIZABETH L. EISE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

DÌYÌ GÈ ZHÌYÈ GÉMINGZHÈ FÈILÌPǔ BĀNGNÀLUÓDÌ

第一个职业革命者——菲利浦·邦纳罗蒂

(1761—1837)

【美】伊丽莎白·L. 艾森斯坦 著

曹茂良 陈友松 译

奚瑞森 朱立人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3)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812-3/D·58

1991年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61 千

印数 0-1 300 册

印张 7

定价：2.60 元

出版说明

在 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曾对新巴贝夫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给予过巨大影响,并为后人研究巴贝夫主义及其密谋运动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的《为平等而密谋》的中译本,现在即将出版。为了配合这部名著的出版,向读者提供了解和研究它的背景材料,我们同时组译了该书作者邦纳罗蒂的传记。菲利浦·米歇尔·邦纳罗蒂(Filippo Michele Buonarroti, 1761—1837),是 19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巴贝夫的亲密战友,平等派运动的领袖之一。1761 年 11 月,他生于意大利比萨市一个贵族家庭,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雕刻家米开朗琪罗的胞弟邦纳罗托的后裔。这部名为《第一个职业革命者——菲利浦·邦纳罗蒂》传记,系美国美洲大学历史学教授、邦纳罗蒂研究者伊丽莎白·艾森斯坦因所著,写于 1957 年,1959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由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翻印。它是迄今比较客观地记述邦纳罗蒂的生平及其革命活动的一部较好的传记。

在本书中,对于邦纳罗蒂革命的一生,作者并没有象通常撰写传记那样平铺直叙地记述,而是在深入研究邦纳罗蒂的基础上,对 19 世纪下半叶以来,特别是十月革命以来所出现的许多有关邦纳罗蒂的著作正反方面的评论,作了充分的分析,就他生平中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因此,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对于邦纳罗蒂的一些过去不为人们注意的问题,作了认真的考证。出身于名门贵族的邦纳罗蒂为什么会放弃优裕的贵族家庭生活,而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

义者？到 1793 年为什么又崇敬罗伯斯庇尔，成为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的热烈追随者？他与罗伯斯庇尔建立了什么关系？到 1795 年，他为什么又从罗伯斯庇尔主义者转变为空想共产主义者？他在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派密谋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所有这些问题，作者在书中都作了交代，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邦纳罗蒂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论据。

第二、对于邦纳罗蒂在 1797 年 5 月被判处流放徒刑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秘密活动，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众所周知，从 1797 年 5 月起至 1830 年，邦纳罗蒂一直处于流放、警察监视、放逐和流亡的生活之中，但是对于他在这么长达三十多年中间，究竟从事了哪些革命活动？过去人们是不十分清楚的。本书作者经过广泛收集资料和长期的悉心研究，现在基本上弄清了这条线索。作者认为，邦纳罗蒂是一位具有坚强革命信念的革命活动家，他在被流放后处境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从未停止过革命活动。他在 1806 年就与反拿破仑的“菲拉德尔夫社”取得了联系，1809 至 1811 年组织了“至圣社”，1811 年参加了“挚友社”的活动，并在每月定期举行的罗伯斯庇尔主义者纪念会上发表演说，1812 年参加了“菲拉德尔夫社”组织的企图推翻拿破仑政权的军事密谋。在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他又与反复辟的各种秘密组织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烧炭党建立了联系，其中包括与马志尼派的合作。到 20 年代初，邦纳罗蒂所建立的秘密组织更加名目繁多。1822 年，“至圣社”的活动因昂德鲁安去意大利执行任务被捕而遭到破坏，邦纳罗蒂又立即着手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国际革命组织——世界会。以后因为与马志尼在意大利革命策略上发生意见分歧而另行组织了“革新烧炭党”、“神兵会”、“真正意大利会”、“意大利解放协会”等一系列组织。在这些组织中，邦纳罗蒂积极贯彻他的策略方针。他认为革命的主要战场应该在法国，而不是在意大利。他说：“法国打喷嚏，

欧洲就患感冒”，只有法国再次掀起革命，意大利才能解放。同时，由于缺乏革命形势，他也不赞成立即举行暴动，而主张采取渐进主义的准备力量。

第三、旁证博引，博采众议。从十月革命之后，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史学界，曾一度出现过研究邦纳罗蒂的热潮，对于散失在这些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和私人手里的有关邦纳罗蒂的材料，曾进行了大量挖掘和整理工作，并且出版了一批论文和专著，如塞塔的《邦纳罗蒂》、加朗特·加伦的《菲利浦·邦纳罗蒂和流亡中的国民议会议员》、莱宁的《邦纳罗蒂的思想》，等等，对邦纳罗蒂的生平和革命活动进行了有益的研究和探讨。但是对于邦纳罗蒂建立的各种秘密组织、它们的活动以及邦纳罗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仍然众说不一，各执己见。对于这些不同的观点，作者在本书中没有采取简单否定或肯定的做法，而是广泛地援引了各家的观点，通过比较研究和分析，提出了他认为比较正确的看法。作者总的评语是：邦纳罗蒂“舍己为人的精神是无条件的，他的热情是不可遏制的，他的事业是崇高的”。因此，本书的出版对于我国广大读者了解和研究邦纳罗蒂将会有很大帮助。

1989年1月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5
第二章 成型时期(1761—1795 年)	12
第三章 新事业的开创(1796—1823 年)	28
一、职业	28
二、组织	40
第四章 开始写一本书(1824—1830 年)	59
第五章 革命者邦纳罗蒂和“世界会”(1830—1837 年)	86
第六章 革命者邦纳罗蒂在故乡(1830—1837 年)	99
一、再入革命的“迦南”	99
二、不可分割的三搭档:泰斯特、达让松和邦纳罗蒂	110
三、以“人民”的名义走上街垒	123
四、以共和国的名义走上街垒	140
第七章 死后形象的变化	151
一、对第一个职业革命者的素描	151
二、结语:历史的裁决	158
参考书目评注	170
一、评近来一些历史学家的论断	170
二、参考书目要览	174
译名对照表	202

序 言

每一位传记作者都与他所描写的人物息息相关。人物越是默默无闻，作家往往就越是小题大做，以便证明不但他自己花费相当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而且也有理由间接要求可能阅读此书的读者花费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写作本书是因为相信邦纳罗蒂应该比迄今得到历史学家更多的重视。写作本书也是由于认为，他作为历史人物的地位有利于人们单纯使用一些已出版的资料和次要的研究便可写成一篇比较简略而意在言外的论文。

为了写成一部论述邦纳罗蒂生平和时代的全面著作需要用几卷篇幅，并且还需要在欧洲各种文献档案中作深入的研究。为了为这项工作奠定基础，有一批意大利学者已着手探索了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根据详细的调查研究写成的几本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已问世。本书的宗旨之一是要引起人们注意这项新的研究工作，并且要把其中某些内容介绍给那些由于语言的隔阂而在最近的将来未必能熟悉它的人们。然而这不过是次要的目的，我希望本书除了作为关于国外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的一份中间报告之外，还能起更多的作用。本书是在意大利的消息尚未传到我国之前就打算写作的，当时认为邦纳罗蒂一生事业的历史意义已经被人忽视了。尽管我在着手写作本书以来对那些陆续大量出现的详细传记资料都曾设法加以考虑，我们认为本书的主要作用是解释性的。所以我只选择和使用最近著作中的一小部分来描写邦纳罗蒂所扮演的、本书名称所暗示的角色。

在本书中，我始终把邦纳罗蒂不仅看作是默默无闻的一位历

史人物，来描述他的一生怎样经历了一个同许多重要人物和划时代事件有相互关系的漫长而动荡的时代，而且还特别把他看作是一位被许多历史学家所忽视、因此大体上尚未明确的新职业先驱者。主要是因为我相信他的一生事业有助于阐明这种新职业的起源，我才试图追踪他一生事业的经历。

可是，在研究邦纳罗蒂的一生事业时，人们必须跋涉荒熟程度不等的历史地带。他的一生历史包括一些曾经深耕过的熟地和其他几乎完全没有开垦过的荒地。对于前一类地区，有许多地方我故意绕过去了，然而偶尔在史料编纂方面作些探讨似乎是必要的。可是，这些探讨被故意压缩了，以便在处理整个题材时保持一定的分寸和统一。关于后一类地区，探索方向的选定势必部分地受到个人兴趣的支配。因此，最近出版的意大利著述的一大部分乃是专门分析意大利复兴运动内部的发展，我个人关心的是十九世纪的法国史实，因而转移了重点并偶尔有些离题，尽管我曾设法紧扣主题并避免纠缠在枝节问题上。

从这种迂回的和离题的做法看来，我对邦纳罗蒂的解释显然与最近编纂论述他的著作的大多数权威学者的解释大有分歧。如果我和那些历尽艰辛收集了本书所采用的许多材料的人们抱有不同意见，而又不在于某些地方指出本书的叙述本身得力于他们的努力的程度，那就似乎是既不礼貌而又忘恩负义了。也许应该在这里向阿曼多·塞塔，罗莎·翁尼斯夫人、亚历山德罗·加朗特·加伦、阿瑟·穆勒·莱宁以及其他一些权威学者由于对文献档案的深入研究所表现的极其渊博的知识和对详细资料的掌握表示敬意；我在下文的脚注内再三引述了一些其他权威的著作，这证明了我得力于他们的程度。此外还应该向翁尼斯夫人、艾米利亚·莫雷利、查尔斯·F·德齐尔、塞缪尔·伯恩斯坦等人致谢，因为他们对不相识的通信人要求获得复印件和资料时，总是彬彬有礼地

及时给予答复(至于亚历山德罗·加朗特·加伦,他则是十分慷慨地把他的著作连同复印件一并寄来给我)。

至于对学术方面的帮助表示谢意是比较习见的。我特别感谢哈佛大学克兰·布林顿教授,他不仅校阅了我的初稿,并敦促我修改原稿以便列入《哈佛历史专著丛刊》,而且还提出了许多详细的评论,惠我良多,我在定稿中已设法采纳了其中的大部分。虽然布林顿教授的鼓励使我有完成本书,他对书中的缺陷当然是毫无责任的。我还要感谢阿姆斯特学院唐纳德·C·麦凯教授和纽约市立学院汉斯·柯恩教授,因为他们校阅了我的初稿并提出了有关本书的参考书目及其出版事宜的一些建议。

巴黎国立图书馆版画室主任艾德门·波尼翁先生和社会科学出版社雷内·伊尔逊先生帮助我物色到了本书的插图。我特别感谢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里昂·鲁策埃教授,他牺牲了部分暑假及时为我取得这些肖像以便赶上排印期限。

其次,还要声明一下。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见到本书扉页上的引语,这是摘自奥登的一首有同样背景的诗:《步父亲的后尘》^①。这一则引语以及第三章和第五章开头的引语,都是摘自伯特伦·沃尔夫的《缔造革命的三杰:传记》(纽约1948年版)。这些引语似乎恰到好处,因而非用不可。而且我当然希望能指出这一事实:在论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的书籍内用得十分惬当的某些语句可以毫不牵强地适用于专论邦纳罗蒂的书籍。

伊丽莎白·L·艾森斯坦因

① 这四行诗摘自 W. H. 奥登的诗《步父亲的后尘》(断章取义),见《奥登诗集》(纽约,1945年版)第95页。这是多承纽约兰多姆印书馆和伦敦法布尔父子出版公司惠允转载的。

第一章 导论

巴枯宁逝世以后，瑞士警方“向阿尔弗雷德·伏格特询问死者的职业或谋生之道。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

E.H.卡尔著《巴枯宁》，第488页。

“在托斯卡纳，有一位名叫菲利浦·邦纳罗蒂的人企图酝酿一次暴动；他被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又在法国继续他的革命活动。”^①这就是后来巴枯宁称之为“当代最伟大的密谋者”^②的人的政治生涯的开端。但是由于他的名字不见于《意大利简史》中的任何其他地方，所以简直不可能指望读者能体会这一插曲的意义。但巴枯宁的话从译成的英文中可以明白地看出，一位职业革命者对其同行的事业进行评价时所给予的最高称颂甚至没有为邦纳罗蒂争得一些体面，把他那拼错了的名字纠正过来。就后世的论断而言，巴枯宁的崇高评价也许颇有疑问。这一评价是以这样的事实为根据的：他所谓的十九世纪的“最伟大的密谋者”是把非常事业变为一种职业的第一人。但是，即使就邦纳罗蒂作为先驱者的无懈可击的地位来说，也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公认。

“在十九世纪之前没有象职业革命者这样的事物——在法国革命树立典范之前是没有的。”^③人们也许同意这句话的第一部分，而觉得第二部分有些令人不解。其实，“树立典范”的不是那复

① 勒·萨尔瓦托雷利：《意大利简史》，B·迈耳译本（纽约1940年版），第489页。

② M·巴枯宁：《联邦主义、社会主义和反宗教主义》，见《巴枯宁的政治哲学》，G.P. 马克西莫夫编（葛伦科1953年版），第277页。书中关于邦纳罗蒂的名字，通常被误拼为“Buonarotti”（正确的拼法应为“Buonarroti”——译者）。

③ R. R. 帕尔麦：《十二个统治的人》（普林斯顿大学1941年版），第20页。

杂的历史性的抽象概念“法国革命”，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革命者——经历了1793年还活着的人。历史学家们对于职业革命者的出现，很少加以研究，他们很自然地被比较容易找到资料的题材所吸引，从而往往忽视秘密的谋反的世界——以前的空想家和未来的无政府主义者所生活的世界，亦即职业革命者所隶属的世界。结果，这个领域便成了心惊胆寒的政论家和政治煽动家可以乘虚而入的领域。康拉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感觉灵敏的小说家以及如埃德蒙·威尔逊和丽贝卡·韦斯特这样的从事文艺批评的新闻记者在这方面作出了最好的贡献。^①

虽然很少历史学家在当时注意到，职业革命者的出现却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新事物之一。那些“非职业革命者”——医生、律师或商人——在特定革命中暂时扮演了这种角色，不过只要他一旦变成新政权行政官员，往往就抛弃革命，这种人在政治舞台上久已为人们所熟悉的人物；但是，常常失业的职业革命者——企图创造一种局势使他的行业有实践的可能，并且对一般“革命”有浓厚兴趣的人——却是一个新的现象。象任何可敬的专门职业者一样，克鲁泡特金能够把他的著作《一位革命家的自传》在《大西洋月刊》上连载发表，这象征着革命者这个新职业在十九世纪结束时所达到的地位。该书书名是十分确切的，虽然它与任何特定革命都毫无关系。

革命者个人与特定革命事件的这种分离情况，在政治上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这种分离情况起源于“道德共和国”的某些热烈的信仰者拒绝承认“新十一月”^②的失败是不可挽回的。这些人认

① 马克斯·诺马德，《革命的信徒》（波士顿1939年版），和E. H. 卡尔，《浪漫的流放者》（伦敦1933年版），上述二书虽然体现了相当程度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是威尔逊—韦斯特新闻传统的“通俗”作品。

② Thermidor 指法国第一共和国的十一月（1794年7月19日开始）。“新十一月”9日（即1794年7月27日），罗伯斯庇尔及其支持者被推翻。——译者

为罗伯斯庇尔的失败、巴贝夫的死亡以及反革命的胜利只是为了实现美好社会而不断斗争过程中的暂时挫折，如同某些战役打败了，战争还是可以取胜的一样。在他们看来，会被大多数历史学家划为革命时期的某一特定时期已经结束后，革命还是长久存在的^①。随着几十年过去了，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越来越脱离任何特定的革命事件。事实上，战争已经失败，但是从未承认失败。相反，宣布了“不断革命。”^②邦纳罗蒂也许是按照这种“不断革命”的需要来塑造他的生命的第一人。当他在二十几岁时，为拥护法国革命，他离开了本国，开始了流亡生涯；他作为一个巴黎雅各宾分子作出的最重要的功业则是在年逾古稀的时候，这种奇特的事实说明了他长期的坚持不懈的事业有非同寻常之处。的确，只是到了他晚年，他才获得了他应该得到的东西，因为他所遵循的是从青年学徒成为密谋的专家、再成为受人尊敬的元老这样一条典型的道路。可是，如果研究欧洲历史的美国学者竟然知道他的名字的话，也不过是从有关十八世纪革命的最后几个插曲之一得来的。

菲力浦·邦纳罗蒂是“巴贝夫密谋案”的研究者早已熟悉的人物。他和巴贝夫^③及达尔台^④一起担当的领导者的角色，尤其是他后来作为研究密谋事件的历史学家所起的作用，必然使关心这一事件的任何学者都对他注目。如果只从他与巴贝夫合作的角度来

① 虽然戈弗雷·埃尔顿在《法国革命思想》(1789—1871) (伦敦 1923 年版) 一书中确曾试行更改法国历史的习惯分期法——按照这样的信念：“革命是继续不断的，在 1799 年什么也没有结束。”(第 87 页)——，却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仿效他。

② 关于这句话(马克思于 1850 年使之成为不朽的名言的讨论，参看 A. B. 施皮策《奥古斯特·布朗基的革命思想》，载于《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丛书》第 594 种(纽约，1957 年)，第 168 页附注及 171 页附注。

③ 巴贝夫(1760—1797 年)，法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反映了新兴法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号召用革命手段消灭私有制。1796 年 5 月密谋泄露，1797 年 5 月 27 日被杀害。——译者

④ 达尔台(1769—1794 年)，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巴贝夫的追随者和战友。“平等派密谋”被告发后，被判处死刑。——译者

了解邦纳罗蒂,那就忽略了十九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的意义。但是,直至最近二十年,关于邦纳罗蒂的寥寥无几的参考文献,除了他被列入人数众多的《意大利解放英烈纪念集》这个唯一的例外,差不多完全和巴贝夫主义或者和它的必然结果——法国社会主义的起源^①联系在一起。在意大利之外,这种情形仍然存在,甚至最近修订的《法国名人传记辞典》(1955年版)也只用了微不足道的篇幅对邦纳罗蒂1815年以后的事业,作了不充分的叙述。^②但法国学者如乔治·勒费夫尔和雅克·哥德科仍然显示了他们对邦纳罗蒂的事业有切实的认识,而塞缪尔·伯恩斯坦最近出版的传记除了已经译成意大利文之外,还译成了法文,尽管还没有译成英文。^③这是由于说英语的历史学家对邦纳罗蒂的严重忽视所致。一位牛津大学教授最近在写《1815—1871年法国革命运动》时,总算两次提到,可又拼错了邦纳罗蒂的名字,一次把他作为影响布朗基的一个幸存的巴贝夫派分子,一次把他作为撰写“革命者的圣经”的巴贝夫派的助手,并且还把日期弄错了^④。1952年,《美国历史》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文章,竟在简短的篇幅之内塞进了一大堆异乎寻常的错误资料^⑤。阿瑟·莱宁的一篇有价值的文章——用英文撰写,载于荷兰出版的一份用多种文字刊印的国际杂志上发表,意味着这种情况正在得到补救,《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细心读者却是从一篇把邦纳罗蒂的名字拼错了的书评里知道这篇著

① 关于更详细的说明,参看本书《参考书目要览》。

② 亚·马丁:《邦纳罗蒂》,见《布吕恩—加布尔法国名人传记辞典》(巴黎1955年版),第673—674页。

③ 参看本书《参考书目评注》,下文第167页注4。

④ 约翰·普拉门纳兹:《1815—1871年法国革命运动》(伦敦1952年版),第27、45页。

⑤ B·希斯罗普和R·克劳甫写的评论文章,载于《美国历史评论》(1952年版)第57卷第744—745页。

作的^①。

邦纳罗蒂之所以未能被公认为是“现代欧洲的缔造者”之一，原因不一而足。他所选择的职业决定他必然默默无闻，并使他不得不用假名假姓和秘密渗透的策略，这就使得他在1837年逝世以后，不大可能“突然出名”^②。由于一个世纪以来编史工作受民族主义情绪和科学专门化的影响而支离破碎，邦纳罗蒂活动的国际性质和这些活动所延续的漫长时间使得他难以博得人们的赞扬。他的形象的轮廓，散居各地的学者们只是断断续续地模糊地看到。而这些学者操不同的语言，而且他们的专业领域（例如巴贝夫主义和意大利的复兴运动），很少彼此起交叉作用。事实上，严重的语言障碍除了不同的民族观点之外，至今仍然使英美学者对于意大利的新兴的研究成果不能给以充分的评价。

在最近十年间，意大利学术界兴起了一种以研究邦纳罗蒂为基础的真正事业^③。亚历山德罗·加朗特·加伦的两本书，阿曼多·塞塔的两卷书，德利奥·坎蒂莫里的两章，还有这些学者和其他权威学者——其中最著名的翁尼斯夫人正计划出版一本全面的传记——在期刊上发表的大量文章，这一切都证明人们又对他感兴趣了。根据翁尼斯夫人的意见，这种重新引起兴趣的现象，是出于墨索里尼以后对于法西斯路线（它试图抹杀法国革命对意大利民族觉醒的影响）的反感作用，这导致了重新强调意大利“雅各宾派”在复兴运动中的作用^④。这里，除了有这种消极因素以外，同时

① 参看关于阿瑟·莱宁，《邦纳罗蒂和他的国际秘密社》的书评，《国际社会历史评论》（1956年版），第1期第112—140页，载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56年9月7日出版，第530页。

② 例如诺马德把他列为一个“梦想家”，而不是列为“活动家”，见《革命的信徒》第17—18页。

③ 关于它的出版物的详细说明，参看本书“参考书目要览”第170—188页。

④ 翁尼斯夫人，《1940—1949年间意大利对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载于《法国革命史纪年表》（1950年），第22期第360页。

还有意大利许多知识分子效忠共产主义这个积极因素；而且邦纳罗蒂的形象又可以被利用来使党的路线意大利化——使它具有历史的和民族的根基，这一点似乎也是明显的^①。最后，有些认为共产主义极权主义不过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所产生的乐观的世俗谬论的一个最终产品，天主教知识分子认为从邦纳罗蒂的事业中是可以佐证他们的观点的新证据^②。

不论这种新的研究动机何在，它本身迅即获得了一种学术动力，把研究工作推向了有声望的学术领域。邦纳罗蒂漫长的事业，差不多每一方面都已需要分别加以史料编纂方面的分析。虽然争论将会继续许多年，随着新的证据的不断发现，现在至少可以明显看出，所有以前的传记资料都已过时。由于邦纳罗蒂的名字在大多数历史书上难得一见，又因为他在他的时代的那些“划时代”事件中实际上只起过最起码的作用，当今修订他的传记也许似乎是一种狭隘的学究式的工作。最近一些研究确有这种现象。特莱福—罗佩尔先生所说的“学术不平等的原则”似乎不止一次在起作用。较大的问题并没有受到较小的言行细节所受到的那种认真对待。即使在旧文献上的积尘正被掸去的时候，这一阵混乱的历史活动的目的仍然往往是模糊不清的。

然而近来关于邦纳罗蒂的许多研究，对于探讨现代欧洲历史各方面的莫衷一是的各种学术工作，是有直接影响的。这些范围较广的对学究式研究的影响，有些将在本书中提到——旨在鼓励更进一步的研究，并使邦纳罗蒂的事业和十九世纪若干重要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楚。可是，本书的主要宗旨是想通过对邦纳罗蒂的事业本身发展的探讨，来对职业革命者这项新职业的起

① 这一点在本书的《参考书目评注》的第一部分中有所讨论。参看下文第163—164页。

② 这似乎是刊载阿森尼奥·弗鲁戈尼的《菲利浦·邦纳罗蒂平等思想的形成》的那家杂志——《人道主义》（1948年5月）第470—482页——的观点。